

无论世界经济如何风狂雨骤,中国仍有极大几率走出危机。但前提是,决策层一定要坚定发展的立场,并坚定既定扩大内需的政策。发展才是中国经济硬道理。只要持续发展,即便是泡沫,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发展冲抵。鉴于中国经济控制很强的特点,治通胀明显易于治通缩,所以,当前政策并未进入到需要大调整的时期,而是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稳定与扩张仍应是中国经济政策主旨

赵晓
最新情况表明,风帆草动下近期房地产市场已开始出现下滑苗头,楼市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稳定都面临挑战,若处理失当,所谓V形复苏的轨迹恐将昙花一现。可以说,现在对政策方向的把握及细节的掌控仍然非常关键。

楼市的稳定与经济稳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通常股市波动在先,楼市波动在中,经济波动在后。楼市在其中具有一肩双挑的特点。楼市复苏先于经济复苏,其近期波动也可能预示宏观经济接下来的波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吃了好几年苦头,直至加入WTO才最终摆脱衰退阴影,这次全球经济海啸,其情景要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得多,为尽力避免经济再次出现大的起伏,我们有理由极谨慎地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

笔者要提醒的是,当前所有复苏指标都难免带有经济快速下滑后的技术性反弹特征,因此不能简单根据过去几个月的环比变

化来推断未来的持续变化,用环比指标简单推断未来要打个折扣。

截至8月,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引擎仍然严重熄火。显然,国际经济的大冬天仍然寒气逼人,并未过去,即便金融海啸见底,也不一定意味着世界经济会很快恢复。如果世界经济衰退,中国经济还能持续“独立寒冬”吗?

消费增长亦是平平。而从8月CPI同比下降1.2%以及PPI同比下降7.9%的数据来看,市场情况似乎还在变糟,供大于求是主要矛盾。国内市场复苏要远慢于经济增长复苏,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暂时还不切实际。

经济复苏的动力最主要来自于投资的加快,但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明显是政府主导与资金推动的结果,而非市场推动和周期推动。从项目隶属关系看,1至8月,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22.3%;地方项目投资增长34.2%。相比之下,民间投资并未积极跟进。即使是被认为已产生所谓过热的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4.7%,比去年同期回落14.4个百分点。另外,1至8月,港澳台商投资下降0.8%;外商投资增长1.1%。这说明民间投资以及国外投资都远远没有跟上。

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也明显来自于资金的转暖。1至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同比增长34.2%。其中,国内贷款增长46.3%;利用外资下降33.6%;企业自筹资金增长12.6%;其他资金增长52.7%。在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增长43.2%;个人按揭贷款增长94.1%。上述数据显示,开发商资金压力减少,主要因为楼市的持续回暖和信贷的金融环境。如此贷款的支撑力量当然不可能持续。

笔者曾提出,按正常情况,贷款增长下半年就会放慢,因为银行出于利息最大化的考虑都倾向于上半年更多放出贷款。同时,票据融资拉动贷款的情形也已发生改变。再加上政府的“窗口指导”,近期频频吹出冷风,可以预料,贷款进而投资以及整个开发商的资金链的情况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贷款增长8月已经开始下滑。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任何政策调整,市场下半年也会因贷款的放慢而自动降温。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只能是,今年中国经济运行充其量只能说是“挺过去”了,而不能说是真正走过了危机。当然,我相信中国经济有足够的底气可以抗击金融海啸的侵袭,在全球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发展的空间还足够大,并且正处于从城市化率45%到60%的快速转换过程中,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有足够的资金量。简而言之,只要政策对头,则无论世界经济如何风狂雨骤,中国仍有极大几率走出危机。但前提是,中国的决策层一定要坚定发展的立场,并坚定既定扩大内需政策。在中国,物价的控制虽然也重要,但不如发展重要。

笔者如此强调“发展论”重于“物价论”,是因为,第一,发展仍是最大的问题,对于中国同样需要重申的是,当前政策并未进入到需要大调整的时期,而是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否则,中国经济难以避免“W形”调整的命运。“W形”的调整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最怕的是经济再次跌落后再往上调会非常困难。微调和完善都是可以的,比如,房地产市场当前可以通过增加供应,尤其是保障房供应来平抑房价,同时,对过度投机作些限制,及时的微调是为了防止出现回调,但微调一定不能搞成回调。从这个角度讲,8月的房地产控制以及信贷控制可能已有些过头,接下来有必要在方向和策略上都调整得更加到位。

国这样人均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政策要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所代表的发展最为关键,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首要目标;第二,中国不必追求过低的物价。1%至2%的低物价,是发达国家的政策目标追求,因为他们的经济增长本来就是比较慢,因此物价也需要控制得比较低。我们不可以将富人的食谱直接拿过来给穷人用。第三,在当前的中国,正物价增长强于负物价增长,适度的物价增长强于过低的物价增长,第四,鉴于中国的政府强势,经济控制也很强的特点,治通胀明显易于治通缩。因此,更要注意防范通货紧缩,而不必过分害怕通胀。第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冲抵泡沫。中国经济如同只有半瓶水的水瓶,可以降价使性价比合理,但也可以把水加满,同时搁上人参鸟龙,卖人参鸟龙茶,如此水价不仅可不降甚至还可提高,可以在高性价比的基础上消掉泡沫。

所以,发展才是中国经济硬道理。只要持续发展,即便是泡沫,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发展冲抵。轻视“发展论”而陷于“物价论”,一会控制股价,一会控制房价,一会全力对付CPI,其方向是错误的,其代价是得不偿失的。

同样需要重申的是,当前政策并未进入到需要大调整的时期,而是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否则,中国经济难以避免“W形”调整的命运。“W形”的调整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最怕的是经济再次跌落后再往上调会非常困难。微调和完善都是可以的,比如,房地产市场当前可以通过增加供应,尤其是保障房供应来平抑房价,同时,对过度投机作些限制,及时的微调是为了防止出现回调,但微调一定不能搞成回调。从这个角度讲,8月的房地产控制以及信贷控制可能已有些过头,接下来有必要在方向和策略上都调整得更加到位。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千万别再让中小企业空欢喜一场

◎周子勋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于中央政府网站挂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8个部分29条具体而具有突破性的意见,又被称作“中小企业29条”。《意见》强调,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是,一个好的政策,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积极去落实,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复苏中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而这“29条”能否真正得以落实,是个考验,恰在同时发生的一件事,不能不说加重了这份疑虑。

据报道,陈先生最近以3万元注册资本注册了一家文化交流中心,公司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而当他持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证件前往附近的招行、工行等大约10家银行开户时,却均被告知公司注册资本少,无法为其开办对公账户。一家银行还表示,存入账户的资金不能提取或周转。“门槛太高了,我们这些小企业都被挡在了门外。”最终,陈先生在与某银行工作人员诚恳交涉后,决定花费1000元购买该行的一只基金,银行同意为其开立账户。当然,银行作为自主盈利的企业,为了规避风险,有权设立开户门槛。但银行作为为公众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也应考虑到社会责任,适当考虑小企业。可见,切实扶持中小企业,细化落实才是硬道理。否则,要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话,难免又让中小企

业们空欢喜一场。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实现转型的必然反映,国际金融危机只是

使这个问题突然激化更加严峻而已。经济转型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社会成本,中小企业首先要承担这个成本。由于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具有长期性。

第一,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是劳动成本上升。近日,随着海外订单的回升,许多企业都在为缺少人员而发愁,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形势下,许多地方都下调了工资水平,可见,人员成本的提升是我国整个中小企业必须面临的问题。

第二,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标志,是资源环境标准提高带来的资源环境成本上升。随着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大增,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过去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时代,我们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今天的中小企业发展不能再重复那样的低成本发展老路,环境成本必然对企业的发展形成重大约束。

要解决这些长期性的问题,惟有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奏效,即中小企业从资源消耗型企业向资源节约型企业转变,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海外市场转向主要依靠国内和国内市场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促进企业增长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发展转变,从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促进企业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企业发展转变。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不能仅要求政府出政策、银行放贷款,而应从治理制约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入手,中小企业自身也要积极找到办法应对危机。要引导中小企业通过加强管理、规范经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来增强自身实力和信誉,不断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偿债能力。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欧洲人把垃圾扔向哪里

荷兰环境部检查官员日前扣留了一批要运往中国的欧洲废旧电子垃圾。近10年来,向中国、印度、印尼以及非洲等国家非法出口垃圾已成为一项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国际业务。欧洲官员居然称这推动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废物贸易。漫画 刘道伟

■专栏·主持 沈飞昊

中国式悖论之根源就在高储蓄



顺差。

在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上,中国是个多解的“芬奇斯之谜”。那么是理论错了,还是中国存在特殊悖论呢?

其实,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两个过程,并非一个变量决定另一个变量的单向过程。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造就以上两种不同逻辑结果,在我看来,可能是两种不同分析方法考虑的主要因素有所区别。国际收支,除了出口也包括进口,如果一国由出口占据主导地位,往往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如果是进口占主导地位,就表现为负相关关系。

从动态的观点看,根据国际收支等式分析,一国经济越是发展,国民收入增加,对进口需求更大,就会导致经常账户逆差。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增长是因,国际收支是果。如果这个关系成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经常账户越是表现为逆差。前面我们讲到的例子主要是进口在起作用。如果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等式分析,出口越多(从而经常账户顺差),国民收入增加,经济越是发展。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业绩正相关,出口(从而国际收支)是因,经济增长是果。中国正是出口在起主导作用,从而呈现与其他国家相反的表现。

然而,光是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仍然缺乏说服力。为什么其他国家是进口主导型的,而中国偏偏就一定是出口主导的呢?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早期,经济快速增长,比如前面提到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投资都大大超过了储蓄,因而

导致这些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中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与这些国家20世纪早期的情形相似,投资也十分巨大,然而却没有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反而呈现国际收支的“双顺差”。这种情形似乎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那就是中国的高储蓄。

我国储蓄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扩大,特别是2000年以后更是快速增长。这几乎与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呈现相同的走势。2007年中国储蓄率超过50%,不仅远高于其他国家(美、日、印、韩2002年储蓄率分别为14.3%、25.5%、28.3%和31%),而且与投资率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这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在相对下降。储蓄率的居高不下,成为目前许多官方经济学家不断扩大投资的当然的理由,也是造成国际收支连年顺差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无论高投资如何令人担心,无论巨额顺差引发的外贸失衡问题如何让人不安,在国内消费未能有效增加的前提下,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目前只能容忍其存在和发展。中国经济越是发展,出口越多(国内无法完全消化剩余产能);出口越多,对中国经济推动力越大。与之同时,外贸顺差还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不断增加的货币投放。货币投放越来越多,没有造成相应的通货膨胀,却导致越来越高的储蓄率,最终造成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就更多。

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式悖论产生的根源。(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奥巴马收回了布什的空头支票之后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是促使奥巴马作出在2015年前将不再考虑启动东欧反导项目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这个反导系统,五角大楼累计已投入1200多亿美元,

布什任前确定的新反导计划要求国会再投入至少200亿美元,其中仅2010财政年度的投入就达90亿。但这仍然无法确保反导拦截试验达到100%的成功。过去4年里,这一实验的成功率不到70%。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如此耗资庞大、旷日持久的军用项目,自然难以逃脱国会严苛的预算审议。奥巴马访俄之前,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就已放出风来,称准备大幅削减反导项目开支。国防部虽然全力争取,但最终国会拨款委员会会在新财年年度只批准了区区25亿美元用于对反导至关重要的激光武器项目,远逊于五角大楼的要求。布什雄心勃勃的远程导弹防御计划实际上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党更喜欢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用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样做的“成本更低”。

美国放弃反导计划,被认为是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最大逆转。但我们稍稍放宽视野就能看到,这实际上在去年南奥战争后就已经开始。布什在8年任期内,不断向格鲁吉亚等新盟友作出空头安全保证,但在南奥战争中,美国的表现却被证明是“纸老虎”。因此,奥巴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收回布什开出的空头安全支票,并通过卸掉那些在过去十多年里不断拖累其从超级大国地位加速下滑的负担而已。这公开表明美国外交已回归现实主义轨道。尽管波兰、捷克、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因此倍感屈辱和伤感,但却徒唤奈何。

俄罗斯多次表示将把签署新核裁军条约与东欧反导问题挂钩,因此,美国放弃东欧反导系统的决定,可以看作是华盛顿欢迎莫斯科重新回到全球安全议题的邀请。美国希望,如果不能和俄罗斯成为朋友,至少也不必再像之前那样敌对。但俄罗斯是否会投桃报李,实现俄美关系“重启”,抑或得寸进尺,等着美国人再次退缩,现在仍难下定论。俄美将签署新的核裁军条约,加大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甚至在俄、白、哈三国联合入世问题上达成某种新方案,但在至关重要的欧洲安全问题上(包括能源安全),莫斯科恐怕会“顽固”到底。即便是被西方普遍认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梅德韦杰夫,也必然要奉行强硬立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无异于政治自杀。

现在仍然模糊的是伊朗核问题。美国放弃东欧反导计划,也接受了俄罗斯一贯的观点,即伊朗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对美构成实质性威胁。这样,俄罗斯在这场反导游戏中不仅赢得了主动,而且获得了时间,克宫现在只需专心对付伊朗这一个对手。但莫斯科是否因此就会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向伊朗施压?从地缘利益考虑,俄国和美欧一样,都不希望伊朗真的拥有核武器;但从经济利益考虑,莫

斯科并不愿维护与之在能源领域构成竞争关系的中东局势的稳定,而伊朗又恰恰是其在中东乱局中最可借重的棋子。看来,这场反导游戏并不会由于美国的让步而宣告完结,幕后更大的交易或许才刚刚开始。

比起美国外交公开回归现实主义和俄美恢复在全球安全领域的交易,美国放弃东欧反导更具象征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冷战后首次重大外交和安全让步,美国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在接下来的6年里(2009—2015年),美国已无力也无意再阻止多极化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其他大国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由于美国已给出了时间表,其他大国的第一要务很明确,即认真对待美国的这次让步,尽一切努力防止美国的鹰派们在2015年后反攻倒算,确保这个进程不会逆转,从而推动世界彻底走出后冷战时代。其次,从后冷战时代的零和观念转变到多极化时代应具备的大势思维。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史表明,所有稳定的国际体制的确立,最初都是妥协而非对抗的产物。第三,建立新的大国全球共治模式。核裁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反恐三个领域应该可以成为开启这一模式的首批钥匙。目前,美国在这三个对其实至关重要的领域都失去了“独断专行”的实力,需要各个大国的合作。换句话说,继东欧反导让步之后,美国在这三个领域还将不同程度的继续让步,这将成为大国全球共治最好的切入点。(作者系国际关系系博士,旅俄学者)